

序说晚清时代

十九世纪上半叶，有着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国与迅速崛起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更可悲的是，中国的封建君主还浑然不自觉，依旧沉湎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中，而厄运正在悄悄地迫近……

虚骄的“天朝上国”

嘉庆中叶后，清皇朝的统治日趋衰弱。统治者却依旧自诩“天朝上国”，虚骄自大，闭目塞听，面对不断前来叩门和骚扰的葡、英等国，不是采取积极应对的举措，而是不思进取，故步自封，不愿了解外部世界，拒绝与外部世界接触，采取了愚昧的闭关政策。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清朝政府以沿海居民与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为由，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朝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这些特许的行商。这些享有特权的行商，一方面是垄断性的商业机构，凡是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也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的委托，执行政治上的职能，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若有漏税欠税，行商负责赔偿。行商又代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行商转达。所以，行商实际充当了清朝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清朝政府旨在利用行商避免与外国商人发生直接关系。

为了限制外国人的在华活动，清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诸如禁止外国人长住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于外商；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自由走动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隔绝，“不相交结”。对中国货物的出口，也有严格的限制，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废铁）、硫磺、硝等物，均严禁出口。丝及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数量，均有限制。禁止茶船出海贸易，闽、浙、皖等地所产茶叶，必须由内河过五岭运赴广州，通过行商卖给外商；如直接出海贩运，则视为“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充公。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工、水手等人不得超过二十八名。严禁将所造商船租于他人，或租用他人之商船。严禁中国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中国。

究其根源，闭关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经济结构的基

石，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即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人们与市场的联系，是相当有限的。这种落后闭塞的经济形态，是闭关政策的经济基础。乾隆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就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邮。”嘉庆帝的上谕也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临到国门快要被轰开时，道光帝还称：“天朝年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以资赋税。”这种自大、闭关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反映。

同时，闭关政策也是清朝政府维持其统治的政治需要。如戴逸的《履霜集》所指出的：清朝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船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强者不害怕异国的新事物，只有虚弱者才对之忧心忡忡。十八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衰世，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朝政府由盛转衰，暴露出相当的腐朽性、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当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策略。只是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所以，它构筑了一

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

闭关政策的推行，后果是严重的。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对外侵略、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域外变化了的世界

当清朝政府还沉湎于虚骄的“天朝上国”的幻想中时，域外的世界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处于迅速上升阶段，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它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在十八世纪末，已经有了使用蒸汽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汽机又应用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进入十九世纪后，英国的工业发展更快。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英国加工的棉花约五百万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已达五亿二千八百万磅，猛增一百余倍。乾隆六十年（1795年）煤的产量为一千万吨，到1836年增至三千万吨；嘉庆

元年(1796 年）生铁的产量是十二万五千吨，到 1840 年增至一百三十九万吨。英国的机器制造业发展也很快，重要的生产资料已全部由机器生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交通运输业发生巨大变革，铁路和轮船投入使用。英国的出口总值也由二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三千余万镑，增加到三十年代后期的每年五千余万镑，其中棉织品的输出占全部出口总值的五分之二以上。因此，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便成了英国资本家的强烈欲望。

紧随英国的是法国。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以机械力替代人力、畜力的工业革命在国内全面展开。首先采用蒸汽机的是棉纺工业。到道光十年(1830 年），法国工业应用蒸汽机的数量还仅六百五十台，1839 年即增至二千四百五十台。 1825 年铁的产量为二十万吨，到 1840 年为三十五万吨。 1830 年煤的产量为一百八十万吨，到 1841 年为三百万吨。 1788 年毛织品出口总值为二千四百万法郎， 1838 年增至八千万法郎。从嘉庆二十年(1815 年)至 1840 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三倍。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独立战争后掌握政权的。嘉庆十九年（1814 年）美国出现第一家新式棉纺织工厂。道光二年（1822 年）棉织工业中心罗威尔开始建立纺织工厂，到 1834 年该地纺织工厂增加到十九家。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工厂开始广泛设置蒸汽机。1840 年棉纺业中开动的纱锭为二百二十八万多个。其工业产量，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和法国，位居第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急切要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处于闭关状态的中国，便成为它们觊觎的主要目标。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以后，英国对华贸易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续上升。十八世纪末，英国对中国输入值占欧美国家输入值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从中国输出值占欧美国家输出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每年抵达广州的英国商船常有数十艘，道光六年（1826 年）曾达八十五艘，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国家。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曾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这个使团由于觐见的礼仪问题，同清廷争执不下。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被清廷逐回。

道光十一年（1831 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发生了议会改革。原先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被打破，工业资本家进入议会。接着，根据议会的决议，英国政府在 1834 年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任何英商都可以自由去中国进行贸易。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措施，也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以前，中英双边贸易是由两国的商业垄断机构一中国的行商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媒介而进行的，英国在华的商务代表由东印度公司派人充当，称“大班”、“二班”，他们必须按照清朝政府在闭关政策上形成的一套规则章程办事。而在这以后，英国政府就直接派遣“驻华商务监督”，代表英国政府同清朝政府打交道。后起的英国工业资本家和那些得以自由来华贸易的商人，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极为迫切。而驻华商务监督也和过去的大班不同，他们比后者更傲慢、更强硬，更不接受清朝政府和行商的约束。相反地，他们要踢开行商，直接同清朝高级官员接触交往，实施他们的扩张策略。中英关系因此进入一个新阶段，矛盾冲突日趋频繁。

道光二十年（1840 年），英国侵略军的炮火强行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在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下，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社会的嬗变与演进

清代后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在政治方面，中国的领土主权不断遭受破坏，从一个独立国家开始变成一个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外国资本主义凭借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在这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而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始终是各种社会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在经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来猛烈冲击，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分解。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即不断扩大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货币资本。国门被强行打开后，随着与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加深，人们对西方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了解日渐增多，开始改变投资的方向。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传入，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部门的新组合。结果，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城乡手工业的变动，农村经济的演变、市场交易的扩大与商业资本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格局的重新组合。轮船与铁路的运行、新式金融业的崛起以及近代城市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新的社会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切实的助力。

在思想文化领域，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必然引起人们思想的变化。在哲学方面，魏源等人试图用古代《易经》阐述的“变易”思想，去解释客观

世界，说明社会历史的演变，并作为要求革新的理论依据。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引进、利用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使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注入了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内容。指出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是简单的量变的重复，而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强调破除祖宗成法、实行政治改革的必要。进化论成为鼓动中国人起来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思想武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阐发和推进了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的变革除了渐进的方式即改良的途径，还有突变即革命的方式，以此作为倡导民主革命的理论来源。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译述也在进行，严复继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后,又陆续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并对中西文的翻译提出“信、达、雅”的要求，对后世影响很大。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到了清代后期，人们开始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并应用于自己的史学研究和著述。梁启超明确提出以进化论的观点编写历史，主张“史学革命”，倡导“新史学”，要求突破旧史书以帝王将相的纪、传为主的体例，改变单纯排列史实的写作方法，要求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认识和解释历史，找出规律。与他同时代的夏曾佑，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了用这种观点完成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该书以上古、中古、近古为三个阶段，上古以西周以前为传疑时代、春秋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以秦汉为极盛时代、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代，隋以下未及完稿。

清代后期，外患频仍。受此刺激，人们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倾注了很大的热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张 穆写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以方域为经，以史事为纬，记

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包括内外蒙古与历代统一皇朝的密切关系，史料翔实，论述精当。何秋涛着重中俄边界研究，咸丰九年(1859 年）完成并进呈《朔方备乘》八十卷，重点考察了中国东北、北部和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包括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并进而考察了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通等有关问题，扩大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视野。道光末年，姚莹完成《康辖纪行》十六卷，对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和戍守记述颇详。与此同时，对外国史地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最初有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后有王韬写于同治十年(1871 年)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重订刊行的《法国志略》,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当时实施的国会制度。光绪十三年，黄遵宪写成《日本国志》,清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旨在以此为鉴，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时代感和历史感兼具。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到清代后期，受时代风云的激荡，新旧嬗替鲜明。道光年间的龚自珍和魏源，都主张改变当时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风气，并身体力行，创作新体散文，叙事明晰，说理透彻，开辟了新的文风。以后，又有康有为、梁启超对新体散文的推进。梁启超的文笔，尤为人赞赏。其政论文感情充沛，论题明确，语言畅达，气势宏大，动人心弦。

清代后期，小说伴随社会的巨变，在题材和内容上都有新的开拓。谴责小说异军突起，引人注目。它以文学的形式，揭露和针砭晚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黑暗，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笔端涉及人间百态，包括官场、商界、华工、女界等各阶层，以写官场最传神。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也被翻译、介绍。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

录》、《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读者众多。苏曼殊等人也有不少译作。

晚清的诗词创作，也有新的变化。宋诗派至光绪年间衍化为同光体，代表者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等人。他们虽也有伤时感世之作，但更注重艺术趣味，自我玩味。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派，则刻意拟古，少有创新。与此相映照，清代后期新体诗词的创作，精彩纷呈。早期有林则徐、魏源等人直面时局、一吐胸臆的忧愤诗作；后期更有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猛烈冲击传统诗坛拟古和刻意追求形式的风气，突出诗歌关注和反映现实的表现力。光绪末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诗坛一展身手。宣统元年（1909 年），革命文学社团一南社成立，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表示反清革命的志向。骨干成员有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人，其诗篇爱国激情浓烈，风格雄浑豪迈。

清后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西学的影响下，章太炎首次明确将传统“小学”改称“中国语言文字学”。代表现代语言文字学的著述，陆续问世。其中作为传统“小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音韵学和训诂学，进展很大。乾嘉学者多侧重于古韵学，到了晚清，有陈澧对切韵音系作全面深入的探讨，他的《切韵考》六卷和《切韵考外篇》三卷，在声母和韵母系统上都有新的结论。在训诂学领域，经书的注释仍有发展，孙诒让《周礼正义》材料的丰富，考证的细密，超越前代学者。中国传统语言学，是将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而分设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并无语法学这一分支。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问世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语法研究论著，该书改变了传统语言学的学科结构，推动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清代后期，京剧已形成独立的剧种，在同治、光绪年

间趋于繁盛，出现各具风格的艺术流派。受民族危机的刺激，京剧艺人上演了一些进步题材的剧目，如《党人碑》、《哭祖庙》、《黑奴吁天录》等。同一时期，川剧、梆子腔等剧种，也进行了改良，改编和创作了一批关注时代和现实的剧目。话剧源自西方，清末传入中国。宣统二年（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组成进化团，是国内最早的专业话剧团，演出剧目有《孽海花》、《恨海》等，针砭现实，宣传进步思想。西洋音乐最初在外侨和教会学校流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归国的留日学生在上海举办音乐讲习会，系统介绍西洋音乐，包括西洋乐曲和声学、管弦乐、打击乐等，颇受欢迎。五口通商后，上海、广州等城市日趋繁华，中西文化交流增多，相应出现与传统画派有别的“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他们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以民间熟悉的题材入画，并将诗、书、画、印结为一体，在人物、肖像，尤其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锐意创新，风格清新。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推动了中国版画的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点石斋画报》在上海出版，随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刊、发行量很大的《申报》附送，流行各省，这是中国石印画报的发端。

清代后期，除佛教、道教等中国原有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外来宗教，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地传播，其中基督教的势力最大，与当地民众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晚清，近代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受时代风云的刺激，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学习和引进，侧重于应用技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潘仕成在广东仿造成水雷。魏源的《海国图志》介绍了蒸汽机的原理。洋务运动期间，新开办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讯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引进了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中国第一批近代军工厂、棉纺织业、轮船公司、电报公司和矿山等，推动了生产力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展。在一些洋务企业，还设有专门翻译科学书籍的机构，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最有成就。该局聘请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等人，参与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决疑数学》、《地学浅释》等书，介绍了近代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学科的科学知识。先进知识的输入，有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宣统元年（1909 年），詹天佑主持完工的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独创“人”字形线路和双机车推引法，解决了工程难题。

在中国历史上，道光二十年（1840 年）至宣统四年（1912 年）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概括地说，这是一段屈辱与抗争、沉沦和奋起并存的令人难忘的岁月。

一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清皇朝的迷梦，封闭已久的国门被震塌，中国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和接踵而至的欧美列强……

鸦片　流毒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品，原产于南欧、中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因为它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曾作为药材征税进口。十七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鸦片是一种摧残身心和使人堕落的毒品，“吸食既久，则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乾，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吸烟久，其人必畏葸庸琐，激之亦不

怒，由其精华竭也。”一旦沾染上鸦片，“吸食者必致按时上瘾，兼有耸肩、流涕等状。说者谓必促寿绝嗣，一坐此病，人皆视为废物”。所谓鸦片贸易，也就成了毒品贸易。

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产于印度的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以及土耳其和波斯鸦片。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后，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用强制或垫款的方式，在印度推广种植鸦片，垄断这种毒品的生产，并使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然后由政府官员在加尔各答市场标价拍卖，交走私商人贩往中国。从十九世纪初年以后，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嘉庆五年（1800 年）为四千五百七十箱，道光十八年（1838 年）递升达四万零二百箱，猛增近八倍。在这三十九年里，总共有四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箱鸦片通过包括武装走私在内的途径输入中国。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鸦片是一种昂贵的毒品，道光年间有人记载：“鸦片之价较银四倍。”大量外国鸦片的输入，使得白银滚滚外流，从而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至少有一千万两白银外流。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导致银贵钱贱。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而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 年）则要铜钱一千五百文至一千七百文，才能兑换白银一两。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平时出卖产品或劳动所得的都是铜钱，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却必须折成白银。这样一来，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大大加重，他们的实际负担即随着银价的升高而同步加重，这种负担在道光元年（1821 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 年）的十九年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英国政府和商人带来的则是惊人的巨额利润。以嘉庆十八年（1813 年）为例，一箱上等孟

加拉鸦片“公班土”，成本不过二百三十七卢比，市场拍卖价格却是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利润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腰包，三分之一则以鸦片税的名义归英印政府所得。当时英国商人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一转手就能获取近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而英印政府每年从鸦片专卖和过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则占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以道光十五年（1835 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 年）为例，其鸦片收入平均每年一千八百万卢比，折合白银约五百二十万两。正如当时人所揭露的，“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英国政府和那些鸦片贩子，因此也紧紧地捆在一起，不择手段地大肆向中国输出鸦片。

大量鸦片的涌入所造成的银贵钱贱，不仅使老百姓陷入困境，也使清政府财政拮据，国库空虚，并使吏治更加腐败。鸦片泛滥后，众多清朝官吏嗜烟成性，终日吞云吐雾，不理政务。据道光十一年（1831 年）的记载，就在京城脚下，吸食鸦片者比比皆是，“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另一方面，由于鸦片贩子以重金贿赂清朝官吏，清朝官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牟取私利。在鸦片走私最猖獗的广东，道光六年（1826 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装模作样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每月私受鸦片贩子贿赂规银三万六千两，便放私入口。该省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竟在道光十七年（1837 年）与外国贩运船约定，每一万箱鸦片送数百箱交水师“报功”，余则放行，甚至以水师船代运进口。而韩肇庆反以缴烟有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毗邻的福建，也是黑幕重重，该省水师官兵的收入，竟有十分之九来自规银。

鸦片泛滥，也严重腐蚀了清朝军队。清军的战斗力，自乾隆中叶后就不断下滑。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军

大多吞饷肥私，花天酒地，士兵则上行下效，漫无节制，道光十五年（1835 年）有人在京城亲眼所见，他们“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鸦片盛行后，也蔓延至军队，“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

面对此情此景，清朝政府不能不引起警觉，商讨对策。当时执掌最高权柄的道光帝，对愈演愈烈的鸦片流毒深表忧虑。他在即位之初，便曾沿袭了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将广东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的三品顶戴先行摘去，责令其督同其他行商严厉查禁外国商船夹带鸦片入口。伍敦元等据此发布通告，要求外国商船入口后必须先行出具没有夹带鸦片的“甘结”即保证书，然后才能充当该船的保商，并准其开舱贸易。这一举措，曾迫使外国烟贩将鸦片走私的地点从黄埔转移到了伶仃洋，然而鸦片走私不但未见收敛，反而日益猖獗。此后，道光帝又不断颁布禁令，制定章程，甚至规定对开烟馆者处于绞刑，贩烟者充军边塞，吸烟者先体罚再服劳役，但都不见成效。

道光十六年（1836 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弛禁鸦片的建议，主张将鸦片按药材纳税进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现银购买；允许民间吸食，但禁止文武官员、读书人和士兵吸食；同时听任内地种植罂粟，以取代外洋鸦片。内阁学士朱珔、给事中许球、御史袁玉麟等先后上疏驳斥。道光帝也没有予以支持。两年后，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主张重治吸食以禁绝鸦片，其具体办法是给予吸食者以一年的禁烟期限，一年后仍有查获则处于死刑。道光帝下令将该折转发各地将军督抚讨论。二十九名封疆大员先后发表了看法，其中二十

一人程度不同地对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提出异议，但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在该片中，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再听任鸦片泛滥下去，则数十年以后中原将没有可以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他立即明确表示支持严禁鸦片的主张，并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要求内阁详细讨论并制定禁烟章程；第二，将首倡弛禁的许乃济革职休致，即强令退休；第三，宣林则徐来京陛见。随后，又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道光帝挑选林则徐去担当禁烟大任，是选对了的。林则徐出身清贫。他的祖上四代都没有科名和官职。父亲林宾日直至十三岁时才入私塾读书，靠勤奋苦学考中秀才后，因家境贫困加上患有眼疾，始终未能再考上举人，只得长期以教读讲学为业。母亲陈氏嫁到林家后勤俭持家，经常夜以继日地带着女儿做女红以贴补家用。据林则徐自述，当时林家贫无立锥之地，宿债山积，父亲的教书收入尚不足以抵债，因而全家人常常有断炊之虞。由于早年生活在社会下层，林则徐对于民间的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

林则徐从四岁起就被父亲带到执教的罗氏私塾，抱在膝上开始了读书生活。他从小便以“擅文”即长于写作而知名，十三岁考中秀才，此后进入福州鳌峰书院学习。在父亲以及同宗前辈林希五、鳌峰书院主讲郑光策等一些为人正直、思想开明的师长影响和教育下，林则徐很早就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并立下了济世救时的抱负，尤其崇拜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在二十岁那年，林则徐考中举人，但此后两度入京会试都名落孙山，不得不像父亲一样为生计而当起了私塾先生。嘉庆十一年（1806 年）秋，林则徐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聘，担任书记即文书。第二年春，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从部属的新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